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译丛

Übersetzungsreihe

der Deutschlandstudien Peking Universität

德国社会 民主党纲领汇编

张世鹏 译 殷叙彝 校

.81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德国社会 民主党纲领汇编

张世鹏 译 殷叙彝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张世鹏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1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译丛)

ISBN 7-301-10093-0

I. 德… II. 张… III.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汇编 IV. D351.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217 号

书 名: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

著作责任者: 张世鹏 译 殷叙彝 校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093-0/D·134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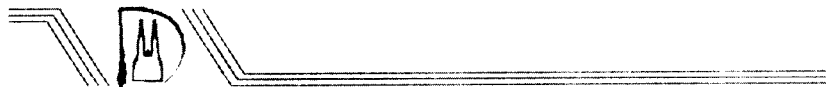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194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为什么要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

(序言)

张世鹏

这本《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是我和我的老师殷叙彝先生合作编译的。在把这些历史文件翻译出来、提供大家阅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

这个问题现在主要是针对学术界提出来的，所有在政治、经济、哲学、社会、文化等各种不同学科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德国社会民主党研究。比如，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曾经说过，社会民主党人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当然，这其中就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关于德国经济模式的理论。更不用说现在非常热门的国外政党研究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和目前的最新动态，都是当前不少政治理论家密切关注的课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研究在中国具有很长的历史，至少在 1949 年以后，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研究，人们（更确切地说，是主持国内意识形



态研究的人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出发确定各种不同的切入点,从而形成不同的研究热点。

一、5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光辉革命历史。在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指导下的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基本原则纲领、组织章程、斗争战略和策略都是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的对象。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学习苏联共产党模式的同时,也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学习两位革命导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量指示,此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党经验同样给予了很大关注。对这个时期德国工人运动历史的研究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不可缺少的背景资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战胜俾斯麦长达12年的《反社会党人法》的英雄事迹,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发动并领导1918年德国革命的英勇斗争在一代中国青年中曾经深入人心。50年代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流行纪念三个“L”,即列宁(Ленин)、卢森堡(Luxemburg)、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每逢这三个人的诞辰或者忌日都要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包括纪念大会、纪念文章、举办展览、出版书籍,包括出版他们的传记。直到60年代初,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狱中书简》、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反对军国主义》、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倍倍尔的《我的一生》、蔡特金的《回忆列宁》都曾经非常畅销。记得作家刘白羽在红极一时的《长江三日》的散文中,大段大段地引述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坐在江轮上,面对壮丽河山诵读这位女革命家的遗作,既革命又风雅,非常典型地体现了那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不像今天,到处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小资情调,醉心于高消费的“雅皮士”。那种对于革命先驱的政治热情在今天已经大大消退。80年代中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卢森堡文选》上卷,印数是6300册,1990年出版下卷,印数只有800册,出版社自己就没有信心,当然更缺

乏应有的眼光和魄力，以致很多想研究卢森堡的人都找不到这本书。德国现在有一个卢森堡基金会，国际上有一个卢森堡研究会，每年都要举行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已经举办多次。卢森堡研究始终是一个热门题目。

二、伯恩施坦批判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到了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研究开始转向，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的“坏人”身上，转移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身上。这是因为从1960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长篇文章起，毛泽东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这个形势下，研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就是挖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坟，当然是“非常必要的”。研究和批判修正主义是垄断中国政治理论研究长达20余年压倒一切的大题目。毛泽东要求每个党员干部，要求青年革命接班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批判修正主义要世代代搞下去。在当时中国政治理论的舞台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最早的典型人物，是“丑角”，或者说，是反面角色，是唱“小花脸”的，实际上在当时的书报杂志上被点名的频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出场”的次数，非常之高，要不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恐怕要永远红下去。还有一个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关的拉萨尔，也在中国被搞得家喻户晓，因为毛主席要全体党员干部、青年人、政治积极分子都学习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所以就连有些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也知道德国有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拉萨尔。但是，当时强调，要批判就得了解这些反面教材，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灰皮书”，其中包括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主要著作，第二国际时期其他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文章也一一翻译出版。按照当时开列的名单，这些代表人物有40多人。这些灰皮书虽然是“内部刊物”，只有



具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购买,但是,真正从事研究的学者也是可以看到的。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部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也被放在“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的大标题下作为灰皮书出版,被分为6个分册,从1964年一直到1984年才全部出齐。这种“乱打一锅粥”的大批判制造了不少学术冤假错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一部分,即基本原则部分是考茨基写的,第二部分即实践要求部分是伯恩斯坦写的,尽管当时这两个人还是获得恩格斯多次赞扬的青年理论家,这个纲领还是被作为“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中国“理论家”的严厉批判。《人民日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一位大学教授的文章《爱尔福特纲领是修正主义纲领》。基本论据就是恩格斯曾经写过一篇《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其实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纲领的正式文本以前总计至少有4个草案,恩格斯批评的那个草案不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写的,恩格斯在向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表述自己的批评意见以后,建议倍倍尔采纳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起草的草案,这封信就收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38卷。我一直想不通的就是上述情况那些熟读马克思主义的“饱学之士”不可能不知道,可是为什么把恩格斯支持的文件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类似的笑话还有很多。《人民日报》、著名大学教授尚且如此,一般群众的革命大批判的质量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所谓“六亿人民都是大批判家”其实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大忽悠”。所谓“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就是最大的“忽悠”。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错误被说成是“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今天回过头来看,至少从理论上这几个概念还都是站得住脚的。1989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讲了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以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①这是邓小平的权威结论。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一直到80年代才最终刹车，70年代后期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还有不少理论家把搞修正主义作为“四人帮”的主要罪恶而且说成是一种极左的修正主义，确实是牵强附会。90年代初还刮过一阵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风，企图重新恢复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传统，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各项具体实践政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各项政策，包括建设市场经济、承认劳动力市场概念，建立特区、引入外资、发展私营经济、允许个人发财致富等等。有人进而要求彻底否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是机会主义的，从来也没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阵风被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压下去了。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②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发表以后，高举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大旗的老左派偃旗息鼓，消停了一阵。迄今为止，在国际上，包括德国在内，也有一批极左派，包括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派、毛派、无政府主义派、托派。他们也坚持认为毛泽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没有错。1998年五一节那天，我在柏林的帝国大厦前面第四国际的图书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② 同上，第375页。



展销中发现一本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文集,其中说,毛泽东最大的功劳就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直延续到戈尔巴乔夫,一脉相承的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改变颜色,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本书还写到,在中国,毛泽东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也都没有错,毛泽东去世,“右倾翻案风”的复辟导致中国山河变色。很多德国左派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复辟”。国际上的这种极左思潮一方面在中国一些思想僵化的老左派那里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对于国内今天不懂历史的青年一代也不无影响。我们从网上看到,一提到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就有一些人打抱不平,表示不满。这些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所以说,不排除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这场闹剧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登台表演。政治上的极左和极右思潮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于现实尖锐的理论问题不能采取“绕着走”的回避态度,就像德国人不回避本民族的历史错误一样,中国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不应回避,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提了近20年,几乎没有人理睬。把本民族的历史错误作为警钟,时时提醒人们不要重犯类似的错误,这是一种明智态度。否则的话,对于“文化大革命”可怕的“集体失忆”很有可能会使我们受到历史的惩罚。

现在再回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这个题目上来。将近20多年的修正主义批判以后,对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正搞懂的人不是很多。80年代初有人写过一本《伯恩施坦传记》,基本上是革命大批判的路数,而且史实有误。伯恩施坦本人的著作基本上都以灰皮书的方式翻译出版了,第二国际时期批判伯恩施坦的著作,包括卢森堡的《社会革命还是改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梅林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等都早已翻译出版。中央编译局甚至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把几次关于修正主义大会辩论的主要发言都已经译成中文出版。但是一直没有看到中国学者关于伯恩施坦研究的严肃学术著作。据我所知,一直有人想为他全面翻案:伯恩施坦当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将会有更大的灵活性,更顽强的生命活

力,不会马上崩溃。现在似乎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说对了。但是,有人说,伯恩施坦预言资本主义将成功地避免危机,避免灾变,避免革命,但是,30年代大危机是不是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是不是灾变?1918年德国革命为什么还是爆发了?这些问题如何看?这些都是很棘手的问题。总之,伯恩施坦研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当然,前提条件就是不搞那种“大忽悠”式的研究,或者心血来潮乱侃一气。至于考茨基还有一个中派理论和教条主义的问题,情况就更复杂。德国学术界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理论家狄特·多沃一直批评说:“伯恩施坦在宣传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过高估计了在威廉帝国虚假立宪的条件下,按照他的思想改变立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进行彻底社会与政治结构变革方面的获胜机会。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不事先进行宪法斗争,这个党就没有可能真正参与政治权力,或者获取政权。”^①换句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还是一个皇帝独裁专政的半封建国家,彻底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条件下幻想实现彻底的社会改良,谈何容易!

三、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与德国资本主义模式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学术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研究的热情再度被呼唤出来。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曾经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始终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要求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什么会在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中转变立场,接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上台执政以后,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做出了哪些贡献?另一个关注的热点就是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这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出力最大。在此基础上,如何把市场经济与社

^① Dieter, Dowe & Kurt, Klotzsch (hg.): *Programmatische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 Bonn Verlag J. H. W. Dietz Nachf. GmbH, 2004. S. 27, 28.



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抑制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限制贫富分化,实现社会稳定,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再加上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倡导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最终形成了对联邦德国现代资本主义模式,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思考。在这个大框架下,还有很多具体的研究题目,从基本原则理论、基本价值观念一直到一些具体法律规定、制度建设、政策措施,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经济民主理论、职团主义处理劳资矛盾的制度方案,如劳资工资协议制、雇员参与共决制等等。

最后涉及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当代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总体评价。20世纪80年代中期胡耀邦曾经号召加强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出版了很多介绍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籍,对以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研究方面的极左错误进行清理,拨乱反正。一直到90年代初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批判的阵风再次刮起来,不许为社会民主党说好话,只允许某些人歪曲删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到处作大批判报告,正常的学术研究完全被干扰。幸好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刹住极左歪风,我们才能逐步恢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们再回到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体评价上来。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所说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多沃和克罗茨巴赫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中,第一个纲领文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件事是意味深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左派脱离社会民主党,另外建立德国共产党。中派和右派把社会民主党引向社会改良主义,成为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一直到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以后,这个党开始变为改良主义的全民党。那么,如何评价社会改良主义?这是一个老问题。

欧洲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地位曾经做过很公允的评价。他说,对于西欧国家来说,“19世纪是自由主义世纪。主要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样一种希望,希望在法律上、政治上能够体现出所有人原则上地位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机会与权利平等,特别是为所有人进入

学校接受教育提供平等的条件——这些就是所提的要求”^①。一旦资本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已经确立起来以后,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我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各国的自由主义政党急剧萎缩,突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这个时候,作为社会改良主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取代传统自由主义政党的位置,“自由主义世纪当时已经走到了终点,社会民主主义世纪诞生了”。达伦多夫强调:对此要正确理解。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个自由主义命题并没有从议事日程上消失或者取消。相反地,它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它毫无削减地进入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只是它不再是推动力量。不如说,推动力量体现在从社会角度加强公民权利的要求中,或者就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在“社会的公民权利”(T. H. 马歇尔)的要求中。贫困、无辜的困境与一种公正的、公平的自由的共同体是不相协调的。所有公民,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一种体面的基本社会地位。所以,必须要打倒“五大恶魔”:“困苦、疾病、贫穷、失业、愚昧”。

恶魔的名单和比喻起源于英国社会改革家威廉·贝弗里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他的主持下起草的一份政府报告把打倒五大恶魔说成是战后英国社会政策的核心命题。国家要通过再分配和强制保险而致力于不要使任何人成为恶魔的牺牲品。就此而言,国家必须成为社会福利国家。在此以前,另一位伟大的英国改革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给市场经济套上了缰绳。他也认为,国家应该起到一种重要作用,也就是在一定情况下,通过聪明的管理来刺激对于商品的需求,以便重新活跃已经逐步放慢的经济活动,创造就业。这两个人,贝弗里奇和凯恩斯,他们的党派归属都应是自由党人,但是,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把社会福利国家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结合起来,这明显地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贯彻实施,一般说来,在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① Ralf, Dahrendorf: *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 Vom Fall der Mauer zum Krieg im Irak* (《历史重新开始,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 Muechen: Verlag C. H. Beck. 2004, S. 222.



在美国,它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欧洲,战争再次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了自由党的选举权改革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伟大社会改革的起因。这一任务,可以由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来承担,但是,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常常是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的政府做了这件事情。联邦总理阿登纳和他的经济部长艾哈德不仅实行了市场经济,而且还实行了共决制和退休养老立法。在工党政府执政6年之后,即1951年,温斯顿·丘吉尔再度上台执政,他声称,对于“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必须要听凭其自然发展。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反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成了发达国家的共同财富。对于所有现在才开始走上艰难的现代化道路的国家,这个方案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①。

达伦多夫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贝弗里奇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都纳入广义的社会民主党方案之中,把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继承关系和彼此区别说得非常清楚。只有从这种宏观的历史比较中,才能说清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我个人认为,抓住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关键,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方面继承了自由主义在启蒙主义时代的一系列基本要求和基本价值观念,同时又把它们扩展到社会福利领域,提出并发展了建设社会福利国家的方案。总之,社会民主党最大的历史作用就是驯化资本主义,努力消除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方面的影响,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人道一些,不那么野蛮,换句话说,就是努力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当然这个改善受到这个制度框架的限制,是有局限性的。我一直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很多问题,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是无法根本解决的,比如欧洲目前持续20余年的大规模失业。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过程中不断地受到自由主义的驯化,也就是历史上社会民主党多次

^① Ralf Dahrendorf: *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 Vom Fall der Mauer zum Krieg im Irak* (《历史重新开始,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4, S. 225, 226.

被自由主义化,第一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按照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道路,抛弃革命,单纯追求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改良;第二次是通过《哥德斯堡纲领》,更多地接受自由主义改良方针,接受市场经济秩序;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党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提出“新中派”理论,更多地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布莱尔、施罗德所代表的这些“新社会民主党人”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消极后果的时候,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不少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所以说,新社会民主党人与新自由主义彼此之间并非相距遥远,而是日益趋同。在一些欧洲国家,例如荷兰,新社会民主党与新自由主义可以结成大联盟,联合上台执政。在德国,也存在这种发展前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最终走到了一起。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统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最近要求欧洲社会民主党放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广泛使用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要求恢复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名称。他把社会民主主义彻底纳入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并且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变种。^①这样说来,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政策就完全彻底地与自由主义重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口号持批评态度。由于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于我们来说,传统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念,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即自由、平等、团结互助当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极端自由主义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坚持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充分体现我们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色。同时我们也坚持认为,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很多问题,包括许多涉及全人类的全球性问题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历史必将用一个更加美好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彻底放弃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选择,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仿效的。

^① Thomas Meyer, *Theorie der Sozialen Demokratie*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2005, S.31—48.



中国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更没有改良主义传统。《红楼梦》、《牡丹亭》的主人公对自由平等的强烈向往也仅仅局限于反抗封建婚姻、要求自由恋爱的两性关系这个范畴。因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太顽固,扼杀了任何社会改良的机会,所以只剩下革命这一条道路,而且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这一条道路。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把慈禧太后描写成不乏改良诚意的统治者,似乎孙中山的革命打断了正常的改良进程,这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歪曲。在理论界总是有人翻着眼头地折腾,最初是全盘肯定革命否定改良,一切改良主义都是革命叛徒。后来是全面否定革命,把一切革命者都说成是暴徒,说成是进步文明的破坏者,用时髦的话说,都是“恐怖主义者”。那种“文化大革命”的“大忽悠”思想方法在很多人的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体观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是思想方法是一样的。

至于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或者社会公正)、团结互助,我认为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顺便提起,几个月前我在长安大戏院听到一出叫《九更天》(也叫《马义救主》)的戏。马义是一个老仆人,他的主人被人陷害,打入牢房。马义为了救出他的主人,逼迫自己的女儿自尽,然后割下人头送到县衙,诡称无头女尸案的人头已经找到,可以证明他的主人清白无罪。就是这样一出鼓吹封建主义忠孝节义的戏!我身边一个小伙子负责录像,戏演完了他对我说:“怎么这样的东西都搬出来了?为什么呀?”我说:“这就是义仆,旧社会的封建帮会,现在的黑社会都需要提倡这种东西。”我想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宣传,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些东西搬出来。听说有人提倡恢复尊孔读经,恢复“二十四孝”的宣传,什么“郭巨埋儿”、“丁香割肉”,鲁迅先生批得体无完肤的东西,也要复辟。电视上天天是皇帝文化,清官文化,主子奴才的说个不停。这都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人的失误,是总体宣传方向的问题。今天有不少人对于恢复封建主义的价值观念非常热衷,而且要在振兴传统文化的名义下把它塞入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这个背景下,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团结互助价值观念明显具有进步意义。我们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实际上搞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封建专制,那么

多的冤假错案，还不是专制？所以反封建主义的任务任重道远。不用说我们，就是在发达国家反对封建主义文化至今也没有结束，日本参拜神社，就是违背自由主义宪法政教分离原则的封建主义做法。西方的新保守主义就是要恢复自由主义努力消灭的社会等级观念，恢复基督教对于政治生活的干预。法西斯主义更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借尸还魂。所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封建主义复辟也不是一个过时的任务。

人类社会发展自有它严格的客观规律，人类不可能消灭这些规律，或者制造出什么另外的规律。尊重客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努力认识这个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办事，才能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推动历史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幻想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超阶段发展，这是俄国民粹派的幻想，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主动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是客观规律在那里发挥作用，不过对于许多人来说，是被动地接受这个规律的惩罚。现在的中国就是要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社会保障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把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方案对于我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欧洲与美国不同，美国没有封建主义传统，而且，用桑巴特的话来说，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美国是一种纯净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欧洲具有很悠久的封建主义传统，也具有长期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主义传统和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整个欧洲的经验教训。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也不是十全十美，有很多问题，现在正在困境中挣扎。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要借鉴，对于他们的错误也要实事求是地批判，在这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还有很多困难，很多阻力，还有很多艰苦工作要做。

这本《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收集翻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自从1863年成立以来所有理论原则纲领和行动纲领。除了1919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纲领宣言》是从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找到的以外，其余文件都是来源于狄特·多沃和库特·克罗茨巴赫编辑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这两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这本书



早在 1973 年就出版了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是在 1984 年问世,1989 年 8 月 25 日年仅 49 岁的克洛茨巴赫英年早逝,1990 年多沃主持出版了第三版,2004 年我收到多沃先生从波恩寄来此书第四个版本。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翻译了其中的几个重要文件,加上以前我翻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几个纲领,编辑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交付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文件的翻译全部经由中央编译局殷叙彝先生的修改校正,所以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可靠的翻译版本。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内现有的 1951 年《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中文译本主要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文件的德文版本与英文版本在字句上略有不同,所以又把德文版本翻译过来,收入这本书中。除此以外,198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颁布以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曾经出版了一个中文译本,译者为解健真、李进军、曹白隼。我们这次以这一译本为基础,补译了 1998 年莱比锡非常代表大会增写的部分,并对原文作了一些修改。本书附录部分收录了多沃和克洛茨巴赫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发展概要》,这是他们编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文件》一书的导言,2004 年 8 月我在柏林的艾伯特基金会大楼拜会了多沃先生,谈到我们翻译纲领的出版计划,他表示无偿赠予版权,并同意把他们的这篇序言收入我们这本书内。在此我们向多沃先生和一切以不同方式对我们提供帮助的朋友们表示感谢。